

# 政治语言研究: 评述与思考

田海龙

(天津商学院 外语系 天津 300460)

**摘要:** 本文主要评述近几年政治语言研究的一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通过讨论分析政治语言的含义、政治语言研究的发展形成和研究方法, 指出政治语言研究区别于其他语言研究的一个特点: 它研究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施加影响)以及公众如何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他们是亲和还是专横)。语言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为我们提出了建构政治语言学理论框架的课题, 对此本文作者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政治语言; 政治语言研究; 认识政治活动参与者; 政治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02)01-0023-07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political language study (PLS) in terms of its theoretical viewpoints and practical method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LS characteristics, its development and approache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PLS concerns itself with the ways in which political actors realize their motives (e.g. undercutting) by making use of language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 audience perceive the true nature of the political actors (e.g. whether they are intimate or aggressive) by analyzing their language. The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PLS has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that make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linguistic approaches and that PLS deserves such a new term of its own as political linguistics.

**Key words:** political language; political language study;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actors; political linguistics

语言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Chilton & Schaffner 就指出:“一方面没有语言政治就无法实施, 另一方面很可能由于语言的应用才产生广义的‘政治’”(1997)。Lakoff 说得更明确:“政治即是语言, 同时语言也是政治”(1990: 13)。语言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方面是研究语言的政治问题, 一方面是研究政治的语言问题。前者研究语言的起源, 语言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等问题。Holborow 1999 年的著作《英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nglish*)以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即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Tian, 2001)。张今、陈云清 1981 年编著的《英汉比较语法纲要》也是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成果。关于这些将另文论述。本

文主要评述近几年关于语言与政治关系的第二个问题的一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称之为政治语言研究。从事政治语言研究者多出于语言学家。他们对政治语言或政治语篇的研究沿着语言学的轨道进行, 同时也体现出一些自身语言研究的特点。本文通过分析讨论政治语言的含义、政治语言研究的发展形成和研究方法, 试图归纳出政治语言研究区别于其他语言研究的特点, 并对开展以汉语为对象的政治语言研究以及构建政治语言学理论框架的可能性进行思考。

## 1. 政治语言的含义

政治语言(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or political language), 也称政治语篇(political discourse/text)。

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语言学家对政治语言的认定也有所区别。如 Chilton & Schaffner 强调语言如何体现政治的功能。他们在政治与语篇之间设置了四个策略功能:强迫;抵制;反对;抗议;掩饰;合法化与非法化,认为语篇一旦表达了这四个策略功能,即成为政治语篇(1997: 212-3)。我们以掩饰为例来说明一个语篇如何成为政治语篇。从政往往不可避免地要控制信息的传递,这有量的控制,也有质的控制。前者说轻一点是对事实的吝啬,后者就是撒谎。表现在语篇上可能是省略所指,或含糊其词,以转移听众的注意。语篇一旦实施这样的掩饰功能,就被认为是政治语篇了。

M d'air 通过定义政治交际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来定义政治语篇。他首先将政治交际定义为“围绕政治所进行的有目的的交际”,它包括:

1) 政治家和其他政治参与者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交际;

2) 诸如选举者和报纸专栏作家这类非政治家和这些政治家的交际;

3) 新闻报道、社论和讨论政治的其他媒体就这些政治家和他们的活动所进行的交流。

然后,他指出,“所有政治语篇都包括在这个定义之内。”(1999: 4)。

与 M d'air 不同, Wilson 只同意政治家本人的演讲才可称之为政治语言,并且批评 Geis (1987) 把政治语言限定在政治性新闻报道上 (1990: 16-17)。

观察政治语言的角度不同,对政治语言的定义也就不同。分析各种政治语言的定义,笔者认为政治语言应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A. 政治语言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政治语言的目的性可以为政治本身所决定。政治即是权威 (power) 的反映 (Chilton & Schaffner, 1997; Lakoff, 1990: 11-13)。语言行为 (或其他行为) 一旦表示权威,即成为潜在的政治行为 (Chilton & Schaffner, 1997)。政治语言不像文学语言那样浪漫,也不像外贸语言那样严谨,政治语言为目的而生。

B. 政治语言应有明确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就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从狭义上讲,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只包括政治家本身,如 Beard (2000) 在《政治的语言》一书中就分析了 Mandela, Thatcher, Reagan, Tony Blair, Lincoln, Brown, Ashdown 等众多政治家的语言。从广义上讲,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还应包括其他与政治有关的活动的参与者,政治语言也应包

括这些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语言。如 M d'air (2000) 将政治组织 (政党、政府、公众组织、恐怖组织)、媒体、公众都包括在政治交流的成份之中,他们的语言都被认为属于政治语言。

C. 政治语言有多样的体裁形式。由于政治语言的前两个特征,它的第三个特征就好像理所当然。事实也是如此,政治家的演讲、答记者问,政党的宣言、标语口号及宣传材料,以及媒体关于政治事件的宣传报道,都属于政治语言。但是,从语言交际学的角度看,政治语言应限定在语言上的交流 (verbal communication) 之内,不应包括像政治家的外表、举止等非语言的交流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 2 政治语言研究的发展形成

毫无疑问,政治语言研究的对象是政治语言,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采用的具有一定体裁形式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语言研究可追溯到古希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修辞研究。那时,修辞是用语言进行说服的口语艺术。“演讲者借助修辞获得支持,最终获得政治权威 (political power)” (郭秀梅, 1984: 1)。这里,“说服”将修辞与政治连在了一起,因为政治语言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至于它的口语特点向书面语的转变,则是由于印刷术的广泛使用所致。现在,报纸、广播、电视每天大量报道着世界各地发生的政治事件,登载着政治家的讲话,记者的采访等等。然而,他们讲话的目的有时并不十分明显,需要用心去揣测。“政治语篇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复杂形式,它本身就需要研究” (Chilton & Schaffner, 1997: 207)。这样,政治语言研究应运而生,它不仅帮助政治家借助语言达到其目的,也帮助普通百姓明了政治家的真实意图,认识其本质。

除了社会对政治语言研究的需求之外,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也为政治语言研究的产生铺平了道路。自索绪尔创建现代语言学以来,人们对语言的研究由研究其结构转向研究其运用,这就要研究语言运用的语境。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 (牛强、陈林华, 1999: 32), 也称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研究语言在不同语境中的运用,形成了语言运用研究的不同侧重点。侧重研究语言在语言语境 (上下文语境) 中的运用形成了语篇研究,侧重研究语言在非语言语境 (情景语境) 中的运用形成了语用学。随着语言运用研究的深入,这种对语言实际运用的研究与

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形成语用学与语篇研究在研究内容上的互动(田海龙,2001),产生诸如语言反映语言使用者的个性,反映他们的思想意识,女性语言特点所反映的她们所处社会地位,以及语言在实际运用中所体现的威力(power)和礼貌(politeness)等课题。

以上课题引起关注的过程也是政治语言研究发展形成的过程。以女性语言研究为例,以往的女性语言研究偏重研究女性语言的特点,最多也不过是研究语言结构或语用表达式与功能意义相照应的问题(Freed & Greenwood, 1996)。这种将语言形式与实际功能简单对应的研究没有将女性语言运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social practice)来研究。政治语言研究则要把女性语言与女性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研究,认为女性语言的某种用法和形式应该是其社会地位低下的表现。“语言上的性别歧视并非生根于语言的结构之中,也不为所谓男女有别的讲话方式所决定。如果认为改变讲话方式就可以缓解社会上的性别歧视,那就更错了,因为讲话方式本身是由对男女的认识所决定的。不与社会变革相连的语言改革终究是有限的。”(Holborow, 1999: 146)“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应该反映在男女使用的语言上。女性语言应该带有被压迫者的印记而男性语言带有压迫者的印记。”(Holborow, 1999: 119)Holborow 的这些论点再明白不过地指出了女性语言研究成为政治语言研究课题的关键所在。

语言反映语言使用者个性这一课题也体现着政治语言研究的发展形成。以人称代词的研究为例,首先,它们是语法学家关注的问题,任何一部语法专著都不可避免地要论述人称代词的特点、分类及句法作用,如薄冰、赵德鑫(1978),Quirk et al (1972)。这种研究Muhlhauser & Harre (1990: 47)称为代词语法(pronoun grammar)。其后,人称代词成为研究连贯性的一个课题,连贯性分为两种:一种为上下文连接(anaphoric),一种为与实际情景连接(deictic)。Halliday & Hasan (1976)对人称代词连接作用的研究侧重于上下文的连接,属于人称代词的篇章研究(textual/endophoric approach)。人称代词与实际情景连接,即语言实际运用中人称代词的所指(deixis)问题,成为语用学家研究的课题(参见Levinson, 1983)。这种研究称为代词的语用研究(pragmatic/exophoric approach)。随着对人称代词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人称代词的使用反映着语言使用者的个

人性格。田海龙(2001)通过调查分析讲话人使用人称代词“我”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发现选择使用“我”或“我们”体现着讲话人不同的个人性格:多使用“我”来表述个人观点的讲话人在性格方面较使用“我们”的讲话人自信,而多使用“我们”来表述个人观点的讲话人在性格方面相对于使用“我”的讲话人来说比较自谦。这种对人称代词实际运用的研究更注重研究人称代词的社会功能,从社会的角度研究人称代词在实际运用中如何实施影响和进行自我保护,以及公众通过讲话人使用人称代词来认识其个人性格。如此对人称代词介入社会生活的研究构成政治语言研究的一个课题。

### 3 政治语言研究的特点

以上讨论使我们认识到政治语言研究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语言学家从关注语言本身转向关注语言使用者的过程。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与政治学中新发展形成巧合。王振海(2000)指出,个性研究是政治学科中出现的一个新领域。政治语言研究即是从语言的角度进行个性研究。

由此可见,政治语言研究并非仅仅是分析政治语言。它更主要是通过分析语言来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它更关注的是语言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因素。这与批判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极为相似。“批判语篇分析是分析社会活动和社会难题中的语言和符号方面,它的中心不是语言本身,甚至也不是语言运用本身,而是社会文化活动和结构中属于语言的那部分特征。”(Fairclough & Wodak, 1997: 271)。

然而,政治语言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又有所区别。政治语言研究所关注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落脚点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以及公众如何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这构成政治语言研究的一个特点,也是政治语言研究区别于其他语言研究(如语用学、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原因所在。政治语言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语言;政治语言研究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政治活动参与者的目的和他们的本来面目。

政治活动的参与者通过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这一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董宏乐、顾萍(2000)分析了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利用被动态、名词化、使用不及物动词、非人格化以及情态动词等语言手段来

达到掩饰动因的目的。下面我们再分析政治家如何使用代词来评功摆好、推卸责任或增强力量。

“The plan I put to place last July is not only on track but is being achieved more quickly than expected Today I announce a tax cut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orking families on low income We do this to encourage enterprise; to reward work; to support families; to advance ambitions not just the few but of the many.”

这是英国财政大臣 Gordon Brown 1998 年所作财政预算报告中的话语。在前两句中 Brown 用“ I ”来指称自己,在第三句中却使用“ WE ”来指称自己,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前两句的内容对 Brown 个人有利,“ I ”去年提出的计划进展顺利,今天“ I ”又宣布减税。在谈及做这件事情时 Brown 使用 WE, 预示出受挫之后与同僚一起承担责任,减轻自己责任的可能,或者增强推行这个计划的力量。

政治活动的参与者通过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把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公众也是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了解他们是亲和友善还是专横跋扈(参见 Ng & Bradac, 1993: 12- 24)。一个广为引用的例子是英国首相 Thatcher 在唐宁街 10 号的台阶上讲到其儿媳要生产时说,“We're a grandmother.”从语义上分析代词 we, 可以指出它的两种意义:一种是包含讲话人、他的同伙以及听众(inclusive we); 另一种只包含讲话人和他的同伙(exclusive we)。Thatcher 使用的 we 属于后一种情况,也称作 loyal we (Lakoff, 1990: 190)。从语用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话语,可以分析它的“合适条件”,它的言外之义以及它的会话含义。Thatcher 使用 WE 的第二种用法(exclusive-we)带有权力和权威的含义,因为 WE 的寓意在于:不仅我自己这样说,我们都这样说,所以你最好相信(Lakoff, 1990: 190-191)。政治语言研究不仅仅满足语言分析,更关注公众如何看待。Thatcher 在谈论自己个人的事情时使用通常为国王和王后所使用 WE, 关注公众如何通过她这样使用 WE 来认识她的个人性格。事实亦是如此,公众正是根据她这样使用代词 WE 才认为她是在显示她的权力(power)所在,“她给自己套上皇家的光环,她太自负了”(Beard, 2000)。

#### 4 政治语言研究的方法

以上讨论使我们认识到政治语言研究的一个特点:它研究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

己的目的(如施加影响)以及听众如何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他们是亲和还是专横)。这个特点虽然不能算作政治语言研究的定义,但它足以使政治语言研究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甚至区别于研究语言运用的语用学。围绕这一特点,政治语言研究发展形成其特有的一些研究课题。然而,政治语言研究还是处于语言学的领域之内,而且还要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如语用学、话语分析)来发展自身。正因为如此,Chilton & Schaffner 在分析政治语篇的时候,采取了语言学的方法(1997)。他们认为语言的所有层次和方面都要顾及:语用层次(说者和听者的交流)、语义层次(词汇的结构和意义)和句法层次(句子的内部结构)。(1997: 214)

在语用层次,Chilton & Schaffner 引入了会话分析和言语行为理论。他们认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在面对面的交谈中根据自己的地位决定是否插话,选择听或说的权利或义务,以及被指定、给予或享有的选择方式,都属于政治的范畴。而言语行为中的合适条件,如讲话人的权威和地位、所在政治组织的威信、选举成功的迹象以及使用的语言文体,则更具有政治的含义。在语义层次,Chilton & Schaffner 特别提到隐喻在政治语篇中的运用。隐喻不仅仅是修辞上的锦上添花,而且是形成和传递某些棘手问题的认知手段。就政治家的交流而言,隐喻能使他们避免直接提及而伤及脸面(1997: 221-2)。在句法层次,Chilton & Schaffner 提及政治语篇中句子组织的两个方面:主位作用(thematic roles)和主题化(topicalization)。前者涉及“谁让谁做什么”的问题,就政治语篇而言,这里所强调的是不了解谁拥有权威就无从了解句子的意义,如“troops sent the government to the Balkans”一句中,政府是有权威的,因而是不能被派遣的。后者关于“先说什么”的问题,句子的词序和句子语调、重音一起使说者能够有选择地强调政治事件的某个部分,并且主宰听众的理解。

Chilton & Schaffner 如此提出政治语言研究的方法,即从语用、语义和句法三方面研究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及听众如何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始终给人一种政治语言研究囿于语言研究的感觉,没有显示出政治语言研究独有的研究方法。与此不同,Beard (2000) 的政治语言研究紧紧围绕政治活动开展,首先探讨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认识,然后对

选举中的语言(标语口号、宣言、演讲)和政治家回答问题的语言(在议院和面对媒体)进行研究。Beard 的政治语言研究方法是从研究各种政治语言的体裁入手,更明显地表现出政治语言研究涉及的问题。

不论从语言层次进行政治语言研究,还是从政治语言的体裁入手进行政治语言研究,都不失为可取的政治语言研究的方法。然而,笔者认为,还有一种方法值得借鉴,即从政治语言体现的社会功能入手来进行政治语言研究。这些功能包括实施影响(表示权威)、进行说服、自我保护和礼貌相待等等,以这些功能为主线,政治语言研究涉及各种体裁和课题,比如论及自我保护的功能,大多要涉及演讲的体裁,课题要包括代词的使用、隐喻的使用等等。然而,不论从体裁、课题,还是功能哪一方面研究政治语言,只要充分体现政治语言研究的特点,都是可取的。

### 5 关于建立政治语言学理论框架的思考

1987年自称是第一部由语言学家撰写的对实际出现的政治语言全面分析的著作《政治的语言》(Geis)出版(见Wilson, 1990: 16),至今已有13年的历史。追溯到1978年Hudson出版《现代政治的语言》1969年Orwell发表“政治和英语语言”,政治语言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如果考虑到古希腊的修辞学,政治语言研究的历史就更长了。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政治语言研究的现状。欧洲的一些语言学家首先认识到语言并非仅仅具有表义功能,也并不单纯反映社会,它还具有参与社会事物和构成社会关系的功能,它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过程的介入力量。在这方面,政治语言的作用尤为突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通过语言达到其政治目的,公众也要通过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政治语言研究受到关注顺理成章。重视政治语言研究,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语言研究一定要与语言赖以生存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任何语言研究,如果只停留在语言的层次,不涉及语言的社会功能,不论怎样从语义或语用的角度来研究,也称不上是实质性的研究。

在我国政治语言研究还未起步,甚至连批评话语分析,“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与会者(第七届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本文作者注)对此颇感为难。”(熊沐清, 2001)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文章散见在学术刊物上。这些文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如辛斌(2000)等,一类是批评话语分

析,如廖益清(1999)。这些文章多以英语为研究对象。《毛泽东的语言技巧》(李少冰, 1993)和《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王永胜、张伟, 1991)以及《邓小平的语言艺术》(杨克定, 1998),以汉语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分析这两位伟人的语言展示出他们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但显缺乏理论的深度。Hodge & Louis (1998)在《中国语言与文化的政治》一书中,对汉语作为政治语言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汉语的思想性极强。汉语一方面表达权威者的权威,表达他们与无权者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显无权者的恭维,显示他们对权威者的附和(1998: 48)。外国人看中国的语言与文化的政治问题,难免会有些偏差(Tian, 2000),但这毕竟不再是孤立地研究语言,而是把语言置于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之中加以研究。这也促使我们进行思考,使我们产生了紧迫感,——我们应该起步了。

我们应该对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加以分析和总结,我们更应加强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政治语言研究。这促使我们思考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独立的地位。这门独立的学科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沿袭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法律语言学(杜金榜, 2000)的冠名方法,这个语言学的分支可冠以政治语言学的名称。它包括两个大的研究内容,一个是语言的政治问题,一个是政治的语言问题。就后者而言,它借助语用学、话语分析以及批判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及听众如何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它有特定的研究课题,如代词(Lakoff, 1990; Muhlhauser & Harre, 1990)、隐喻(Beard, 2000: 19-22;)、女性语言(Holborow, 1999: 97-148)等;也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如政治家的演讲、答记者问以及关于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构建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无疑可以对语言学习和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同样,语言的政治问题也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其研究的历史也很悠久。从马克思、恩格斯出版《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到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以及Vobosinov《马克思主义与语言的哲学》和Vygotsky《思想和语言》,直到1999年Holborow的《英语的政治》,人类从未停止对语言与存在、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探索。

重视对语言的政治问题的研究,使我们思考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在外语学习中树立唯物主

义世界观的问题。现在,我国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人非常之多。他们都知道 sit 这个词加-ing 要双写字母 t, 成为 sitting。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 sit 是重读闭音节。几乎没有人去想 sitting 是记录[siting]的符号。sit 加-ing 要读成[siting], 书写起来就要双写字母 t, 否则就不是声音[siting]的记录,而是声音[saiting]的记录。这里有一个语言的声音是第一的、书写是第二的问题。语言学习中少了唯物主义,就分不清哪个是第一的,哪个是第二的,就认识不到事物的本质。

### 注释:

关于英语中掩饰动因的手段,参阅董宏乐、顾萍,英语中掩饰动因的手段,《外语教学》,2000(4): 21-25。

### 参考文献

- [1] Beard, A.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M]. London: Routledge, 2000
- [2] Chilton, P. & Schaffner, C. Discourse and Politics [A]. In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C]. van Dijk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7: 206-230
- [3] Fairclough, N. &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C]. van Dijk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258-284
- [4] Freed, A. & Greenwood, A. Women, Men, and Type of Talk: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J]. *Language in Society*. March, 1996: 1-26
- [5] Geis, M.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M].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1987.
- [6]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M]. Britain: Longman, 1976
- [7] Hodge, B. & Louie, K.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8
- [8] Holborow, M.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 [9] Hudson, K. *The Language of Modern Politics* [M]. London: Macmillan, 1978
- [10] Lakoff, R. *Talking Power: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Our Lives* [M]. USA: BasicBooks, 1990
- [11]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2] McNair, B.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 [13] Muhlhauser, P. & Harre, R. *Pronouns and People: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Personal Identity*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 [14] Ng, S. H. & Bradac, J. *Power in Languag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3
- [15] Orwell, G.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A]. In W. F. Bolton and D. Crystal (eds). *The English Language* [C]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6] Quirk, R. et al.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2
- [17] Tian, Hailong. Review of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 *Discourse and Society*. 11 (3), 2000: 424-426
- [18] ——. Review of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J]. *Discourse and Society*. 12 (2), 2001: 252-255
- [19] Volosinov, 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 [20] Vygotsky, L. *Thought and Language* [M]. MA: MIT Press, 1962
- [21] Wilson, J. *Politically Speaking: The Pragmatic Analysis of Political Language*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 [22] 薄冰, 赵德鑫. 英语语法手册(修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23] 董宏乐, 顾萍. 英语中掩饰动因的手段 [J]. 外语教学, 2000(4).
- [24] 杜金榜. 从目前的研究看法律语言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J]. 现代外语, 2000(1).
- [25] 郭秀梅. 实用英语修辞学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
- [26] 李少冰. 毛泽东的语言技巧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 [27] 廖益清. 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 [J]. 山东外语教学, 1999(2).
- [28]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M].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846/1965
- [29] 牛强, 陈林华. 语境新探——试论语言语境的解释和制约功能 [J]. 外国语, 1999(2).
- [30]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A]. 斯大林文集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0/1985
- [31] 田海龙. 语用学与语篇研究的互动关系 [J]. 外语教学, 2001(2).
- [32] ——. “我”、“我们”的使用与个人性格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4).
- [33] 王永胜, 张伟.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 [M]. 济南: 山东大

# 认知语境 互明 关联 明示 意图

## ——关联理论基础

陈开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 关联理论在我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真正弄懂关联理论,了解该理论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差别,就必须先弄清关联理论的基本概念。本文着重讨论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认知语境、互明、关联、明示及意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认知语境;互明;明示;交际意图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02)01-0029-04

**Abstrac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being paid to Relevance Theory (RT) in China. To really understand this theory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T and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we nee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s. This essay is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basic concepts of RT: cognitive environment, mutual manifestness, relevance, ostension and intention.

**Key words:** cognitive environment; mutual manifestness; ostension;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 0 引言

话语交际的内容及理解过程是语用学的核心课题。符号学用语码模式——将交际过程看作思想编/解码的过程——解释交际。Grice 为代表的现代语用学(亦称新法语用学)以推理模式——认为话语理解旨在推理出说话人的意图——解释话语交际。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关联理论,在批判和继承上述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明示——推理模式,认为交际过程是说话方提供关于其意图的明示刺激,听话方推理寻求最佳关联理解的过程,这就是关联理论的交际综观。

依据认知心理学理论,关联理论在话语交际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将传统的静态语境阐释为语境对交际双方只能是互明的,不可能是对等或互有的;认为交际过程是说话方将思想意图以言语刺激明示给对方,听话方则依据明示刺激、语境等推理得出最佳关联的解读,从而获得语境效果。

关联理论问世十多年来,在认知科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尤其是在语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围绕该理论的讨论、批评和赞扬持久不衰。为弄清该理论的创新与不足,有必要对其理论基础进行剖析。本文旨在从认知环境与互明、关联与明示、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等几个关联理论的理论基础方面进行评

学出版社,1991.

[34] 王振海. 论政治学的学科特征[J]. 政治学研究, 2000(3).

[35] 辛 斌. 批评语言学与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J]. 外语教学, 2000(4).

[36] 熊沐清. 话语分析的整合性研究构想[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1).

[37] 杨克定. 邓小平的语言艺术[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38] 张 今, 陈云清. 英汉比较语法纲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收稿日期 2001-06-12

责任编辑 毛彩琴